

祥云轩 红山玉龙鉴藏 与 真伪辨析

李祥云 著



蓝天出版社

样云轩
红山玉龙聚藏
与
真伪辨析



中国书店

作者简介

李祥云，原籍天津市，回族，编审，曾任文学月刊《章回小说》主编，为黑龙江省收藏家协会理事、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

1960年于绥化中师毕业，1966年于黑龙江教育学院中文专业毕业。曾任中学教师，任文化馆、艺术馆创作员、创作辅导员。1986年以后任编辑、副主编、主编。曾发表长篇小说《血迹》、《黑狐殿》及中短篇小说七十余万字。

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藏与研究中国古代玉器，侧重于红山文化玉器。《黑龙江画报》、《黑龙江晨报》、《退休生活》、黑龙江电视台均对其收藏与研究古玉的情况作过介绍。

2000年退休后，致力于编撰《祥云轩古玉收藏与研究》一书，于2003年元月出版（文物出版社）。

现为中国古玉器研究会副会长、赤峰红山文化研究会顾问、《中华古玉》副主编，致力于收藏与研究中国远古古玉器（汉代以前的古玉），在《收藏》、《中国收藏》、《中华古玉》、《收藏快报》、《北京晚报》等报章杂志发表五十余篇论述与鉴析古玉文章。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展示红山文化玉龙的图集，也是中华古玉收藏中第一部龙的图集；

这是我国第一部集中展示近三十种不同形象的红山文化玉龙的图集；

这是我国第一部鉴析与对照红山文化玉龙真伪的图集；

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红山文化玉龙的专著；

这是我国第一部鉴定红山文化玉龙的文字最详尽最透彻最有真知灼见的专著。

本书首次提出我国文明史应从太昊开始，即6000余年。

《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一书，是李祥云先生继《祥云轩古玉收藏与研究》出版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分为图录与文字两个部分：图录300余幅，真品图录250余幅，有玉勾形龙、玉兽首龙（玦）、玉龙神共128件，仿品50件、图50幅。论述、说明、鉴定红山文化玉龙以及仿品的文字近30万字，论文67篇，真伪玉品说明与鉴定的文字176条。文字详尽、深刻、切中要害，揭开了红山文化玉龙（玉器）真品的神秘面纱，剥开了红山文化仿品的巧妙伪装。

本书是一部学习鉴选红山文化玉龙（玉器）与研究红山文化玉龙（玉器）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理论价值的重要著作。

祥云轩

红山玉龙鉴藏

与

真伪辨析

李 祥 云 著

蓝 天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 / 李祥云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2007.11

ISBN 978-7-5094-0045-6

I. 祥... II. 李... III. ①红山文化—古玉器—鉴定
②红山文化—古玉器—收藏 IV. K876.84 G8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87480 号

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

著 者: 李祥云

责任编辑: 张春艳

装帧设计: 王 绘

摄 影: 祥云轩

出版发行: 蓝天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复兴路十四号

邮 编: 100843

电 话: 010-6698371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精制轩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大 16 开 889 × 1194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94-0045-6

定 价: 398.00 元

近年来，红山文化玉器的仿制技术相当成熟，造旧水平相当高超。有几种类型的仿品，被社会上一些人认可，致使其品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致使甚爱红山文化玉器之士望而却步，不敢涉猎其品。红山文化玉器是中华六千余年（本书见解）文明史上的瑰宝，是人类美术史上远古玉雕的伟大奇迹。如果不能领略古人之创意，不能破译远古玉雕真品之“密码”（或真品依据），不能珍视珍爱珍藏作为伟大古典美术玉雕极品的中华瑰宝——红山文化玉器，我们当代人真是无颜面对我们的聪慧睿智、极富创造力的中华祖先，真是无颜面对我们中华祖先精心留给我们的红山文化玉器这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序

北京故宫博物院 章宏伟

红山文化玉器材质



图1 青绿玉



图3 青玉



图5 青玉

收藏是人类保存和发展文化的一种活动。收藏活动及其藏品，往往体现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状况，印证着当时的科技水准和文化风尚，而且会从一个直接的角度标示出其时人们的审美趋向。

中国有收藏的传统，从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来看，殷商时期就有收藏活动。河南安阳殷代各期遗址中，特别是在居住区和手工业区遗址内，曾发现许多灰坑，坑壁规整并有抹草泥者，可能是作储藏用的窖穴¹。《尚书·顾命》记述周成王祭奠仪式中井然有序的物品，陈设中有舞衣、大贝、赤刀、弘璧、雕玉以及种种宝物，凡所陈列皆像周成王生时。这是文献记载最早的收藏品。²《尚书·旅獒》中诫人，谓“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³，可见“玩物”在周代已颇成气候。周代王官珍品收藏之处名曰“玉府”、“天府”⁴，有专职官员藏室史负责管理藏品，老子就曾任“周守藏室之史”⁵。春秋时期列国的交往中，玩赏之物已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左传》中不时提及各国常以宝物搞外交或行贿赂，涉及名物宝器的品类已很不少。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观孔子之遗风”⁶。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大学者都有较多的藏书，如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⁷；“惠施多方，其书五车”⁸，书籍的收藏和流传的增多，有助于当时学者们聚徒讲学，开展学术讨论，著书立说。后世私家藏书之风由此而兴。《左传》记载昭公十六年（前526年）晋国韩起出使郑国，“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为了凑齐收藏，而“买诸贾人”⁹，大概是中国最早为了收藏而交易的记录。战国时，甚至出现了专事盗墓窃取随葬宝物的。“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¹⁰盗墓之风猖獗，严威重罪不能遏止，厚葬又进一步助长了盗墓风气的漫衍。¹¹

历朝历代，收藏都是帝王贵族们的一种特权，也是他们热衷的一种活动。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¹²又命刘向、刘歆等典校藏书，经过20多年的努力，圆满地完成了大规模的图书整理编目工作。¹³南朝诸帝王多好学能文，宫廷收藏书画珍品的数量动辄以数十万计。梁元帝萧绎极嗜收藏，仅藏书一项便达到14万卷之多，内府收藏的书画精品更达到了一个顶峰。后西魏军围困江陵，萧绎见城池将破，“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令折”，“乃聚名画法书及典籍二十四万卷，遣后阁舍人高善宝焚之”。¹⁴几朝皇帝所集，悉数付之一炬。西魏将领于谨在劫后余烬中捡得书画四千多轴，是为仅存的九牛一毛。这是收藏史上一大浩劫。

南朝收藏风气盛行，名迹买卖以至造假开始成为普遍现象。南朝宋明帝时曾奉诏编次二王书的虞和在《论书表》¹⁵中就有书法名迹作伪的记载，当时造假手段很为高明，一是染色，二是作皱，三是真伪掺杂，往往可以瞒天过海。

隋“炀帝即位，秘阁之书……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来古迹名画，于殿后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迹台，藏古画。又于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¹⁶

唐代宫廷中收藏的法书名画数量大增。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几至成癖，对其书迹的搜求更是不遗余力，由之还衍生出有名的“萧翼赚兰亭”故事。帝王之外，贵族豪富也竞相收书画名迹或古籍珍物，乃至有“自号图书之府”的。社会上各类美术品的流通和收藏都更显活跃，“忆昔咸阳都市合，山水之图张卖时”，¹⁷市井卖画风气已经普遍。张彦远说，“贞元初有卖书画人孙方颙，与余家买得真迹不少”，¹⁸他们“手揣卷轴，口定贵贱”，画价之高低差别很大，“二万”、“一万五千”或“一万”不等。吴道子所画屏风每片需二万金。¹⁹书画藏品从唐代开始出现鉴藏印记。除朝廷藏品的“贞观”、“开元”等印章外，尚有润州刺史徐娇的“东海”印，其子太子少师徐浩的“会稽”印，唐宗室李造的“陶安”二字印，张怀瓘的“张氏永保”印，王涯的“永有珍秘”印等，这种钤押的方式，已肇后世私家鉴印风气之先。

宋代是我国文物收藏和研究的一个高峰。皇室收藏如太平兴国年间“诏天下郡县，搜访前哲墨迹图画”，宣和年间宋徽宗派侍臣到市肆悬赏搜求古画。更值得重视的是收藏的庶民化、艺术化和商品化。当时汴京颇有名气的潘楼下面热闹非凡，“每日自五更市合，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²⁰大相国寺更是商贾云集的中心市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²¹也就是古玩书画文物的专业市场。民间流行金石书画的赏鉴收藏，已有骨董行，“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²²士大夫竞尚收藏，欧阳修收藏历代石刻拓本，李公麟收藏古代铜器，并对夏商以来的钟鼎尊彝进行研究，考定世次，辨别款识。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共同致力于金石书画的搜集和研究，所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等共2000多件，米芾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并多蓄奇石，为中国藏石之鼻祖。他喜欢钤印，凡属他自藏的书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辨”。而所用印鉴竟至100多枚，按他所评鉴的不同品级，分别钤上种种不同的印鉴²³，这在收藏史上也是开新风气的做法。米芾所交往的收藏者甚多，他分之为“好者与赏鉴之家为二等。赏鉴家谓其笃好，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能自画，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货力，元非酷好，惹作标韵，至假耳目于人，此谓之好事者。”明显就是内行和附庸风雅者的区别。米芾在其书中提及的收藏行家有百名以上²⁴。随着私藏之风的盛行，对藏品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古代文物开始从士大夫手中的古玩变为有价值的资料，并且首开金石研究同古代文献的考订相结合的学风，涌现出一批有关文物研究的著述。当时文物的分类、藏品的登录等项目都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从米芾所著《画史》、《书史》，邓椿《画继》，周密《云烟过眼录》，官修《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博古图》等著录书籍看，其时朝野公私收藏都至为可观。吕大临于宋元祐七年(1092)成书的《考古图》，开创了古器物著录书籍的体例。黄伯思政和年间为秘书郎，得纵览册府图书和钟鼎彝器，是有名的鉴赏家，洛下公卿家商、周、秦、汉彝器款识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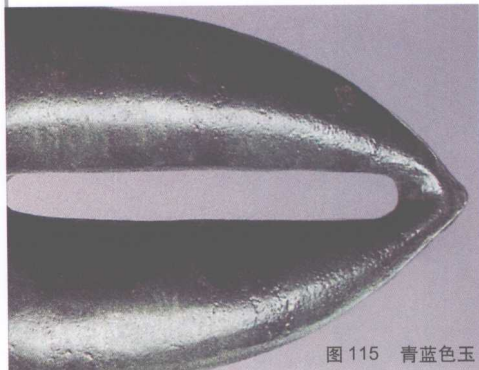


图115 青蓝色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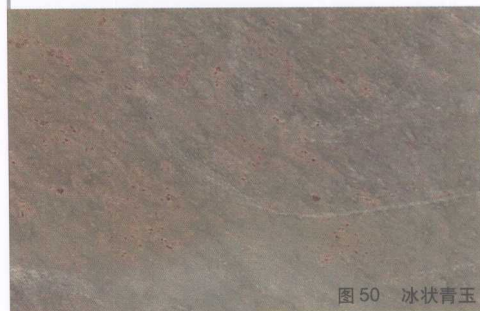


图50 冰状青玉



图12 淡黄玉

能道其本末，辨证是非。其平日议论题跋，后为二子辑成《东观余论》二卷。

元代内府的收藏品，是在接收金及南宋内府大量收藏的基础上进一步搜求补充而得，可说南北宫廷的珍品秘藏荟萃于一处，其数量与质量都相当可观。书画藏品买卖的风气已经极为普遍，倪瓒“平生无他好玩，惟嗜蓄古法书名画，持以售者，归其直累百金无所靳。雅趣吟兴，每发挥于缣素间，苍劲妍润，尤得清致，奉币贽求之者无虚日”²⁵。古玩的说法在元代已流行，元曲中有语：“若到人家里，见了那好古玩，好器皿，琴棋书画，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无，教那伴当每借将来，我则看三日，第四日便还他，我也不坏了他的。”²⁶

明代洪武年间，曹昭著《格古要论》，分为古铜器、古画、古墨迹、古碑法帖、古琴、古砚、珍奇、金铁、古窑器、古漆器、锦绮、异木、异石等各种门类、所涉及的范围已很广泛，体例已堪称完备。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收藏之风在民间蔓延，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时尚，董其昌《骨董十三说》在列举了种种收藏赏鉴把玩之后，特别强调说：“人之好骨董，好其可悦我目，适我流行之意也。充目之所好，意之所到，不先于骨董也，至骨董而好止矣。”²⁷陈继儒于古玩文物极留心，他记述苏州仕宦收藏风气极盛时说：“黄五岳云，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若陆完神品画累至千卷，王延晶三代铜器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²⁸收藏之风的普遍、专业，收藏门类和品种远比前代扩大，连以往未在藏家视野之内的蟋蟀盆、香料之类物品，也成为一些人嗜之为宝的藏品。明代政局承平，经济发展超乎以往，赏鉴收藏之风流行已久，达官显宦富商大儒莫不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自己所喜的珍品。出现了一批藏品甚富、眼光很高的大收藏家，如收有元明多家精品的王世愚、人称所收“冠于东南”的黄琳、工书画精鉴别的张孝思、精于目录学的叶盛、所藏善本碑帖更胜于“天一阁”的安国、以制墨和收藏名家的吴廷珪、工书善文平生好作伪书的丰坊，等等。而书画名家董其昌、米万钟、陈继儒等，也是蓄书贮画，收藏名品甚多的人物。项元汴精于鉴赏，其天籁阁中收藏有法书、名画、金石、瓷器等，储藏之富在私人收藏中冠绝古人。而且，有关鉴藏的各种著述体例多样，内容日趋丰富完备，颇有精辟的见解，对后世有较大影响。张应文撰《清秘藏》、高濂所撰《遵生八笺》之五《燕闲清赏笺》、谷应泰撰《博物要览》，对器玩的辨别鉴赏都有详细的记载，涉及器物广泛。而张泰阶著《宝绘录》，故意著录伪品以求售，则更是收藏史上的奇闻。

清代，无论是收藏还是对藏品研究，均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收藏发展史中一个重要时期。清高宗乾隆皇帝对文物搜求最力，历代珍品无不囊括，包括各种古代铜器、卷轴书画、宝石玉器、缙丝、拓本等，不胜枚举，成为帝王中古代文物的集大成者，并奠定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基础。乾隆皇帝嗜玉成癖，尤其喜好“三代”玉。清宫遗存的古代玉器，多数是乾隆时期收集的。乾隆皇帝还亲自进行古玉器的鉴别、定级，倡导对古玉的考证和仿古玉的制造。

清代的民间收藏也很兴盛，从贵族官僚到殷实富户，都以收藏古物为时尚。乾嘉朴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据的研究，鉴赏文物之风兴盛，训诂考据成果璨然可观，又加上简牍、印泥、石刻、瓦当、甲骨及各种古物大量出土，更拓宽了考据、鉴藏、赏玩的范围，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文物收藏家、研究者，梁清标、孙承泽、耿昭忠、安岐、卞永誉、



图 71 黄玉



图 32 浅黄玉



图 26 青玉（水沁）



图 34 墨绿玉

高士奇、孙星衍、梁章钜、吴荣光、陶梁、孔广陶、葛金娘、陆心源、邵松年等，莫不以鉴藏或鉴赏闻名四方。

书画藏品的著录，内府有巨著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等，其他门类如青铜器、陶瓷、玉器、织绣、文房器具及其他赏玩陈设之物的著录书，也是林林总总，内容至为丰富。梁同书《笔史》、周嘉胄《香乘》、张燕昌《羽扇谱》、王廷鼎《杖扇新录》，沈心《怪石录》、金元钮《竹人录》等等，从书名即可见当时列入赏鉴范围的物品已很广阔。不仅古董器物书画为人珍爱赏鉴，即使新出的小物件，若制作精良，可供清玩，能满足时人之需，也大有市场，“近日小技著名者尤多，皆吴人。瓦壶如龚春、时大彬，价至二三千钱。铜炉称胡四，扇面称何得之，锡器称赵良璧，好事家争购之，然其器实精良，非他工所及，其得名不虚也。”²⁹清代有关收藏的著述多有特色，梁启超曾指出：“初，此等古物，惟集于内府，则有《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等官书，然其文字皆摹写取姿媚，失原形，又无释文，有亦臆舛。自阮元、吴荣光以封疆大吏，嗜古而力足以副之，于是收藏寔富，遂有著录。阮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名家有刘喜海、吴式芬、陈介祺、王懿荣、潘祖荫、吴大澂、罗振玉。式芬有《捃古录金文》，祖荫有《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有《愙斋集古录》，皆称精博。其所考证，多一时师友互相赏析所得，非必著者一人私言也。”³⁰

近代以来，民间收藏古玩、字画、典籍的风气与以往相比有增无减。中国向有“乱世藏金，盛世藏宝”的传统，当前，一股收藏热潮正在中国大地兴起，有数千万民众参与，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热度之高，都是空前的。

李祥云先生在人们对收藏还没有足够认识的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他的收藏活动。他关注专一，对玉器情有独钟，对高古玉器有强烈的收藏嗜好，特别是红山文化玉器。他藏玉、赏玉，沉迷其中，“对古玉，尤其对汉代以前的古玉，喜爱程度真是天天玉不去身，时时玉不释手，一只放大镜随身带，工作之余也要偷闲观察一番，出行办事手上亦盘玉不止，每每为玉表上出现的异样新色而暗暗自喜。”³¹东北的好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是他经常逗留的地方，多年的积蓄化成了他的藏品，经过近20年的用心搜寻，使他拥有了一定规模数量的珍贵藏品；在长期的收藏实践中，他把自己的收藏品当做研究资料，深入分析，寻找规律，不断总结，使他拥有了出色的古玉鉴赏能力。从中理出发展沿革，钻研学问，研究别有心得，写出论文专著，2003年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祥云轩古玉收藏与研究》，现在又有这部《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其勤奋可见一斑。祥云先生是当之无愧的收藏家。收藏家能对自己的收藏品进行研究，立足点虽然是自己的收藏品，但又不是完全囿于收藏，而要做大量的研究分析工作，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工作。这样的收藏家对社会的贡献相对来说也要大得多。这样的收藏家，在李祥云之前，有编著《明式家具珍赏》的王世襄，编著《墨林史话》的尹润生，编著《清墨谈丛》的周绍良，编著《中国年画发展史》的王树村，以及马未都等等，都以他们的贡献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祥云先生沉醉于弄玉，固然有其个人的机缘、兴趣、爱好原因，实际上也透露了他个人的品位和长远的经济眼光。任何收藏品都具有收藏的文化、历史价值，但从藏品的经济价值来衡量，还是有价格高低之分



图10 黄绿玉



图98 黑白杂玉

的。古玉无疑是属于具有较高价值的一种收藏。祥云先生收藏古玉，起先是一种业余娱乐消遣，这种文化式的休息表现在赏玩自己珍藏的时候会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一天劳作的疲倦顿然消减，每当搜集到一件精妙之品或新品种时，一种欣然陶醉、自得其乐之情油然而生，搜寻它时所付出的种种辛劳也在悄然之中消散得无影无踪。渐渐地，收藏成了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收藏给了他娱乐与趣味，收藏也使他增长了博物知识，收藏还培养了他的毅力和事业心，养成条理化的工作习惯，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收藏使他老有所为，生活充实，对生活更加眷恋。他在整理欣赏藏品时总是全神贯注地集中精力，调节了神经，防止了大脑的衰老，对健康多有裨益，因而显得年轻而有生气。而且珍贵的收藏品的价值却与日俱增，它的不可再生性和所浓缩的巨额价值，使不少人视收藏为一种重要的投资。藏品升值，投资得到高额回报，其乐无穷。

收藏是一件怡情养性的好活动。但历来都有一些人认为搞收藏的人难免玩物丧志，并举出很多实例大加引证。其实收藏究竟有益还是有害并不决定于活动的本身，更主要地取决于参与者的价值定向和自控能力。如果收藏者有正确的价值定向并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不仅不会玩物丧志，反而会玩物长志，收藏成才。祥云先生把藏品和他人生的追求紧密联系，产生一种激励和鞭策作用，其人生态度、生活观念值得学习。

玉是美石中的一种，色泽美丽，适于雕琢，具有美观、耐久、稀少的特点，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中说：“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指一切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³²古人辨玉的标准是“体如凝脂，精光内蕴，质厚温润，声音洪亮”³³，玉在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古人之词，凡甚美者则以玉言之。《尚书》之‘玉食’，《礼记》之‘玉女’，《仪礼》之‘玉锦’，皆是也。”³⁴因而，收藏玉器就是收藏美，史前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玉器，无不渗透着原始信仰及宗教文化中的审美意识，也无不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收藏的陶冶情操、赏心悦目的功能中具有审美的意义。在远古时代，就出现了玉、石并存。本来，玉的产地不多，原材料难得，雕琢玉器的工艺困难而复杂，上古玉器之极珍贵是不难推想的。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已有玉琢礼器及饰物，只是一般体积较小，型制简朴，表面也无装饰雕刻。玉文化是中国文明中一支最古老的文化，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玉器是距今8200年的兴隆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一对白色玉玦³⁵，相当于这一时期的玉器，还有内蒙古巴林右旗与辽宁阜新县查海遗址的出土品³⁶。经科学检测，9件查海玉器均为透闪石质地的软玉，是目前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真玉器³⁷。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遗址出土的玉佩饰，上面已雕刻了饕餮纹样。商代后期的玉器数量骤增，仅妇好墓一处遗址就出土了700多件。不过，在殷墟发掘的近千座平民墓葬中，却鲜见玉器。可见，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这极奢之物。根据考古学界历年的研究所得，玉器中相当大的部分是礼器或与礼制有关之物，使用范围与身份有关。哪些人不能使用，哪些人可用而且能随葬，都有严格的等级差别。在古代的中国社会，玉由于天然材质本身的完美性，它很早就撇开原先的实用功能蜕变为某些观念和意识的象征，成了纯粹的精神之物。半透明的质地，温润晶莹，经过工匠精细的加工琢磨，造型精致规整，细腻光洁典雅，这些特质是其他物品难以比肩的。玉器早就被赋予道德人格的含义，这就是“九德”³⁸。这种象征后来竟喧宾夺主反过



图30 碧玉



青碧玉（云雾状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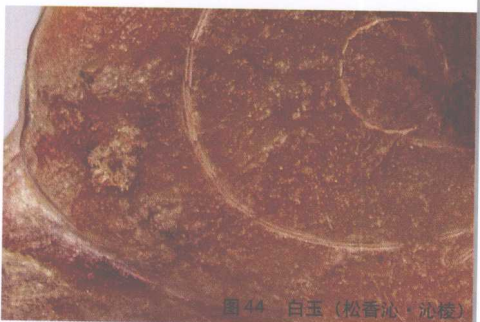


图44 白玉（松香沁、沁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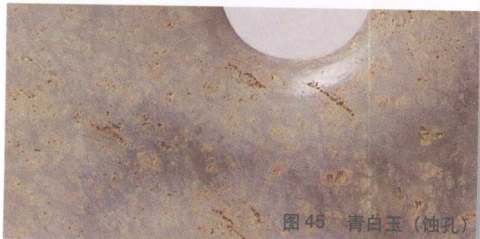


图45 青白玉（蚀孔）

来成了玉之所以值得珍重的第一理由。当玉被选出来作为一种特殊的材料之后，首先被用做首饰，接着被用在祭祀神灵、巫术信仰、政治统治、身份尊卑、财富象征等方面。甲骨文中已有“玉”字³⁹，孔子论“贵玉贱珉”时赋予玉以十一德⁴⁰，以玉比德，君子“温其如玉”，终生佩玉，“无故玉不去身”⁴¹。《礼记》所记玉的温润而泽、缜密以栗等自然特性都被孔子解释为类同人的仁、智、义、礼等美德，并且因为玉兼具多样的美德，所以倒成为君子的道德楷模。玉文化的沉淀已大大超越玉的自然属性，使玉成为君子的化身，人们赋予玉以德行化、人格化的内涵，这种理念的产生是玉文化内涵的一次重大飞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对人的品格的评价中，孟子就曾用金声玉振来表彰孔子的功德⁴²，玉质之坚洁、玉色之温润成为德操高洁的最佳比喻⁴³。《说文解字》称玉为“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忤，洁之方也”⁴⁴。玉被认为德性、质色、音声皆美。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中，玉成为至善至美境界的象征。玉德在中华民族的观念意识及其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历代文人在古玉诠释上极其重视“首德次符”的原则⁴⁵。人养玉，玉养人，祥云先生多年藏玉、赏玉，沾染玉气，为人谦和，温文尔雅。

祥云先生曾长期居住和工作在东北地区，对红山文化玉器情有独钟。祥云先生把红山文化的发展时间界定在“从查海文化前后（至今8000年）到小河沿文化（至今4800年）之前”⁴⁶，与考古学上的定义有一定的偏差。红山文化是在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发现的一种考古学文化，“从分布密度和文化面貌的典型程度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到大凌河中上游之间最为集中”，“主要部分的年代跨度在距今六千至五千年之间”^[47]。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在辽宁牛河梁一带发现了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大规模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以及相继出土的玉器、雕塑，而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红山文化时期正是各地古文化个性充分发展的时期，也是诸文化频繁交汇的时期。目前学界已经提出了“红山诸文化”的概念，包括在红山文化分布范围内发现的一些与红山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虽以与红山文化同时共存、相互影响的诸文化为主，但也可包括先红山文化和后红山文化，即包括了红山文化的源和流在内。查海—兴隆洼文化为红山文化形成的前身，距今约8000年，是红山文化的主要文化来源，更是红山文化玉器的渊源之一，其玉块的形制与红山玉猪龙形块比，除无猪首外都有所相似。赵宝沟文化距今约6500年，是一种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有重合而年代又相近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目前出土玉器相当少，但从出土的陶尊上已有猪龙等刻纹图像看，其有玉雕猪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小河沿文化与红山文化既有文化因素的前后承袭关系，又有较大变化。可以说，查海—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这个文化序列的玉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玉器就出在这里，具有中国玉器的开创性意义。而祥云先生界定的“红山文化”正是涵盖了这个文化序列的相关文化，而又以玉龙来贯串，应该说眼光犀利独特的，他不是学考古出身，而能抓住这个文化序列相关文化的共同特点，由此我们也可见他的判断力。用“红山文化”来点题，也未尝不可，因为它实际上包括了红山文化源流的几个发展阶段。于建设主编的《红山玉器》实际上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统领全书的，只不过在书前加了一篇《红山诸文化与红山玉器》⁴⁸。



图47 混合青白玉



图25 墨玉（玻璃光）



本书图外 紫晶

红山文化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玉器，二是龙⁴⁹。“在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里，有一个与其他史前文化墓葬很不相同之处，那就是只葬玉器而不葬或很少葬陶器及其他器物”，可以说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红山人有爱玉与崇玉的文化特色⁵⁰。红山文化玉器以其时代早、分布地区远离中原、风格独特又近于商周玉、特点较易掌握，以及种类之繁多、造型之多变、内涵之深奥等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学者们在红山文化玉料的来源、玉器概念的界定、玉器的区系研究、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问题、红山文化玉器的礼器性质、红山文化玉器与中国文明起源、红山文化玉器与古史传说等方面开展了比较集中的讨论。

红山文化玉器的种类，据目前所见，可以分作动物形玉、简形玉、勾形玉、玉璧、珠形玉、特形玉、棒锥形玉、玉兵、玉工具、玉料等十个大类。动物形玉中又以龙形玉居多，其共同特点是都以圆雕技法制作，为环形体，突出首部，简化躯体。因而祥云先生在对红山文化玉器的把玩中，对龙形玉器就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红山文化玉龙是中华龙孕育诞生时期的典型之一，研究它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距今大约1万年左右的时间开始，我国的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的使用、陶器制造的开始，农业的出现，居民村落的普及，氏族制度的形成等，是这个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新石器时代延续了五六千年左右的时间，到距今4000年左右结束。这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也就在距今1万年左右，山西吕梁山南端吉县柿子滩石崖岩画就有了“鱼尾鹿龙图”⁵¹。

辽宁阜新查海遗址于1994年6~10月间发掘时发现一条兴隆洼文化石块堆塑龙，用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砾石摆塑，全长19.7米、宽1.8~2米，蜿蜒于遗址中央的基岩脉上。龙首、龙身石块堆摆厚密，龙尾石块堆摆较松散。龙的整体造型昂首张口，弓背曲身，尾后伸，观之有腾飞万里之势。这条石巨龙距今已达8000年，⁵²是我国迄今发现造型最大、形象特征与历史时期定型龙的特征很相近而又年代最早的龙。

辽宁葫芦岛市杨家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两条在红褐色地面上用米黄色黏性土堆塑出的龙形图像。两龙头均南向，尾朝北。一号龙身長1.40米，高0.77米，昂首，挺身，扁嘴，Y字形尾扬起，作飞腾状。二号龙比一号龙略小，身長0.8米，高0.32米，昂首，展翅，翘尾，作轻盈飞翔状。这两条黄色土龙体呈蛇形，距今约8000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土龙。

内蒙古敖汉旗境内兴隆洼遗址出土一件矮腹陶罐，腹壁黑色压光，其上刻画一条猪头蛇体状的龙的图像。龙身饰网格纹、条纹和错点纹，似遍体满布星光点点之鳞，又有勾连纹满饰器壁的四周，宛如蛟龙游弋于浮云流水之中，距今为7000~8000年。⁵³

20世纪80年代初期，陕西渭水流域宝鸡市金陵河西岸的北首岭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蒜头壶上，发现了以鱼形为主的原龙形象。这条鱼形原龙具有细长的身躯，呈弧形盘曲于陶壶的肩部，头部方形，圆眼，头两侧有暴起的巨鳃，头与背部均有斑状花纹，而其腹部则为U字形叠弧状花纹，背部两鳍，腹部一鳍，尾部分为三叉。“龙”的尾部绘一只短尾、尖嘴、体形肥硕的大鸟，鸟喙与“龙”尾的中间部位相连，状似啄衔。⁵⁴考古工作者曾把这一图案定名为“水鸟啄鱼图”。⁵⁵距今6800~6000年。

1988年3~9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后岗类型）遗址距今6000多年的第45号墓内，发掘出用蚌壳精心塑造的龙虎，虎左龙右，



图81 水晶



图40 青金石



图41 戈壁蓝石

均背向墓主人，头朝北。位于墓主人右侧的龙，昂首、竖耳、张口、吐舌、曲颈、弓身、长尾、短足、利爪，前足着地，后足抬起，呈行走状。身长1.78米、高0.67米。位于左侧的虎，头微低、竖耳、张口、伸舌、牙齿锐利，尾下垂，四肢交替作行走状。身长1.39米、高0.63米。墓主人为一壮年男性，身高1.76米，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原始社会的艺术家精心选用形状各异、大小有别、正反不同的蚌壳（仅个别略作加工），用俯、仰、相互叠压等多种手法，巧妙地摆放蚌壳，塑造出龙、虎形象。摆塑技艺娴熟，造型惟妙惟肖，视之如生龙活虎。在第45号墓中，与龙虎蚌塑（第一组）共存的还有另外两组蚌塑图案。第二组蚌塑图案摆塑于第一组南面20米处，图案的主要动物为龙、虎、鹿，龙虎同躯，鹿卧于虎背上，龙头上方还塑造一只蜘蛛。由此可见，后代所见的龙戏珠图起源很早，而且应是起源于中原。第三组蚌塑图案位于第二组的南面25米，是人骑龙图，一人骑于一条龙的背上，人身与龙头同向，人之一手上举并回首，似向人们摆手辞别升天而去，龙的北面还有一只奔跑的虎。⁵⁶

1993年6月，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张陈村焦墩遗址发现一幅卵石摆塑龙图，系选用大小不一（大者5~8厘米、小者1厘米）和色彩各异的卵石摆塑而成。龙塑成侧面形象，昂首朝正东，尾向正西。龙头形似牛首并作冠状饰，头上塑单角，龙口大张，长舌吐出并向上卷至头部，龙身呈波浪状，尾上卷，背上有一不规则形鳍，腹下两足作爪状，鳞光闪闪。整体造型如腾云驾雾，神态生动威武。此龙体长达4.46米，颈至头顶（昂首最高处）高达2.26米，摆塑于红烧土面上。⁵⁷此龙属大溪文化龙，距今为6000多年至5000多年间，可能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龙年代相当或略晚。

内蒙古清水河岔河口遗址，在一条深4米、宽8米、直径245米的围壕沟遗址中发掘出两条用黄土夯筑的巨型鱼龙形图像，头尾相对，伏卧在深沟之中。眉眼、鳞甲、躯干、背翅清晰可见，形象生动，具有神秘性的原始宗教特点，距今约6000年。

20世纪70年代，在甘肃省甘谷县西坪文化遗址和武山县傅家门遗址先后发现了以两栖动物大鲵为龙的主要原形的原龙形象。西坪鲵形原龙，距今5500年。原龙纹像绘在一个高约80厘米的大型陶瓶上，这条墨彩绘制的“龙”高38.4厘米，形似鲵而神似龙：圆形的头部很像人头，圆圆的眼睛睁得很大，眼球居中而显得格外有神，下颌为露出板状牙齿的大嘴，颈部有U形纹，体长尾大，呈斜V字形外翻，腹部具有网纹，“龙”体的上部两侧具有伸向上方的双臂，手臂很短，具有四趾。傅家门鲵形原龙，断代在5000年前。它的形体与早于它500余年的西坪鲵形原龙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墨彩更加浓重，其大嘴下撇不露齿，腹部更加肥大，头部长出六个分叉，如角状羽状之物，并由两肢增加为六肢，爪也更加突出，因而整体看来更增加了龙的特色。⁵⁸

在内蒙古敖汉旗的小山遗址中，在一件陶尊上发现一条猪首蛇身龙的图像，时间距今为6000年前。⁵⁹

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了一件碧玉龙，高26厘米，龙体系用一整块玉料加工而成，色泽碧绿，完整无缺。龙首吻部前突，稍稍翘起，嘴口紧闭，鼻端平缓；端面近椭圆形，细长的双眼微微凸起，如梭形；额头和颌底都刻有细密的斜方格纹。龙的身躯光素无纹，并弯曲成“C”字形，无足、无爪、无鳞、无鳍，基本上可以看



图94 玛瑙（土坑）



图107 绿松石（沁状）

做是蛇的变形。只是颈脊上长鬣飞扬，恰似一匹飞奔的骏马。在光滑的背部弯弧中间，有斜穿的小孔，可供悬挂佩戴。当玉龙悬挂起来时，龙首与龙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上。此龙造型奇特，雕琢细致，是史前玉龙的精品。据考古专家研究，这件玉龙属于红山文化晚期，距今已有5000多年，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玉龙。⁶⁰1988年又在同一旗的广德公乡黄谷屯发掘出这种近似马头的马形原龙，时代比前一条“龙”略早。这件“龙”形玉的造型与前者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其鼻端不是一个平面，鼻孔也非圆形，而是两条短线。这条“龙”的背部也有一孔，“值得注意的是圆孔边缘靠近背脊处磨痕十分明显”，这进一步证实了此类玉器确实是用来说挂的。⁶¹

1983年至1985年，在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的一座中心大墓中发现两条玉雕“猪龙”被置于墓主人尸身的胸前，背靠背，吻部向外。⁶²这种猪形玉龙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红山文化遗址中也有出土。1975年出土的玉猪龙，器高15厘米，形体粗壮而蜷曲，首尾几近相连，如环状；通体呈鸡骨白色，局部有黄色土沁；周身光素无纹，只有头部有所变化，肥头大耳，双耳上耸，吻部前突，阔口微张，龇露獠牙，像极了发怒的野猪。阴线刻出大眼，并延伸集中于鼻翼处，形成几道褶皱。整个面部构型的力道均集中于微张的口鼻处，有种向前的张力，似蓄势待发。只有背部所穿一孔，在提醒着人们它只是一个悬挂饰物，可以想见，能佩戴这件饰物的主人，其身价地位是何等的高贵。在赤峰红山文化彩陶中还出现了猪形原龙的龙纹，长长的嘴巴，长长的獠牙，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猪龙原形。

在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中也发现有玉龙，时间距今约5000年。如在余杭反山两座墓墓主人的胸前发现圆牌形玉饰共13件。⁶³圆牌的边缘饰一对浅浮雕龙首。龙首有高角、圆眼，阔嘴，鼻作复线菱形。瑶山祭坛墓葬中也发现有饰龙形玉器。如在一件玉璜上浮雕装饰有4个龙首，犹如传世的“蚩尤环”。龙为方嘴，嘴内刻画上列门牙9—10枚，下唇及下列门牙隐去不见，眼球及眉脊用凸起的圆雕表现，两眼上方有一对凸起的犄角。此外，还发现有龙首圆牌，龙首的形态与玉璜相似，全器犹如互相吞噬着下半身的三条蟠龙。又发现有38件玉镯，每件镯的外壁有4个相同的龙首形浮雕装饰。龙首除眼、鼻、口、耳之外，最突出的特点是也有一对犄角。仔细审视图案的各个部分，眼和牙近似水牛和鹿，鼻如猪，角和耳非牛、非鹿，似为多种动物组合成的图像。⁶⁴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龙山文化（属陶寺类型）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带蟠龙纹的彩陶盘。彩陶盘红边黑底，彩绘原龙纹蟠曲其中。“龙”的头与身体无明显界线，无颈，头与身直接衔接，颈两侧各有一后掠的短棒状物，眼睛小而圆，吻很长，利齿成排，口吐长信，身体近似于蛇而修长，蜷曲成环状，无足，遍体鳞甲，对称成行，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蟠龙盘曲之中间若有水纹或云纹，此处之龙似为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或升天。距今4000多年。⁶⁵

龙的起源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一样，是多源的⁶⁶又归于统一的。它并非诞生于某一地区，而是先后或同时分别诞生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氏族部落之中。龙也并非仅有一个模式，随着地区和氏族部落的不同，它的造型和艺术形式也各有特色。在文明起源期，中华大地存在着10余种原龙形态：有的似马、猪、牛，有的似虎、熊、鹿，有的似鲛、鱼、蛇，多姿多态，形象各异。关于龙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



图 7-3 东陵石（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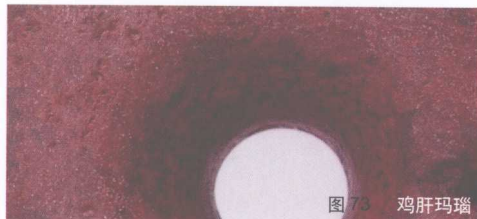


图 7-3 鸡肝玛瑙

红山文化玉器（玉龙）之沁



图 9-2 网脉状沁



图 15 黑色沁纹·甘黄沁

流行的是“图腾崇拜”说。但奇怪的是，原初龙的形象，虽然形态各异，而却有一致的基调。它们都不是对某个动物的直接的描绘，而是在一条弯曲的身躯和长长的尾巴上，加上别种动物的形象。也就是当远古的人们在不同的地域创造龙的形象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人们创造出超自然物象，定当会赋予它超自然的力量，以寄托在艰难生存中的期盼，这也许是龙的艺术形象创造时的初衷。这个特征是龙整个成长历程中的基因，也是把各种形象的龙融合定型为一种基本形态的主干。考古学发现，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不同的文化区系，它们都各自有根，后来才逐渐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原初龙的形象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区系，经过漫长的岁月，龙的艺术形象由简到繁渐渐演变，走向一致而终于定型。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以一种去取代其他各种，而是在基调上不断增添，好似是把各种原初龙的形象都集中在一起，有所选择，有所淘汰，整合在一起，再加修饰而成。这是一个大手笔，居然能把各种动物的形象集中于一身，而使人感到天衣无缝，活灵活现地逼“真”。中国的汉字，起源于象形。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即象形于各种艺术品中龙的形象，其结构与写法，有多种多样，说明是群龙集中并存的时代。战国、秦汉的“龙”字笔法渐多，逐渐统一定型，也正是群龙整合而定型的时代，这是必然趋势。以致许慎作《说文解字》，还真以为龙是“鳞虫之长”。他没有见过原初龙的形象，似乎也不知道有甲骨文，以汉代定型的龙形象和定型龙字去想当然，只能是臆测。汉代龙的艺术形象基本定型，恰好与中华民族多源文化的融合，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统一，是同步而行的。龙的形象好似一个徽志，象征着兼容并包、求同存异，互助互利，共存共荣，这是它的最伟大之处。

祥云先生这部关于红山文化玉龙的专著，对研究中国龙文化，研究红山龙文化会有重要意义与影响。

祥云先生这部《祥云轩红山玉龙鉴藏与真伪辨析》收藏玉龙百余条，根据形制，分为玉勾形龙与玉兽首龙两类，进行了详细剖析，从玉勾形龙的龙首、龙目、鼻额、鬣髯、体尾，到玉勾形的磨制、磨痕，从玉兽首龙的龙目、鼻唇、龙耳、额头、身躯，到玉兽首龙玦口的样式、锯痕、穿孔，分类之细密，分析之透彻，是以前论著所没有过的，可见红山玉龙在细微之处有着变化，可以用之于历史文物的断代依据。对样式多样的红山玉龙如此集中地展示排列，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虽然“近20年间发掘出土的红山玉器不过百余件，确系出土但非发掘的回收、收集的玉器真品亦不过百数十件，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大学及收藏单位保存的传世真品，经核实的也不超过百余件，估计还可能多，若加起来将近四百余件，如果将近十几年间公私收藏的四百余件真品，据不完全统计则总共有八百来件，若从宽算也就千件左右吧。”⁶⁷况且红山文化玉器的引起追寻，是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以及河北北部地区的文物收购部门不断从当地收购到这类玉器。红山文化玉器的传世品早就在世流传，民间藏品肯定不少，我国第一个鉴别出红山文化玉器研究，解决了近百年来悬而未决的这批玉器的时代和文化归属问题的孙守道先生，其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红山文化玉器新品新鉴》，就认为“不论是先前的传世品或现今的流传品，尤其是后者，不可能都是一假百假而没有一件是真的”，因而在他生前的最后10年，“在公私收藏品中，在真假红山玉器鉴定中，把真的辨认出来，记录下来”，把真的红山玉器抢救出来保存起来。全书收录了325件



图19 白色沁片·沁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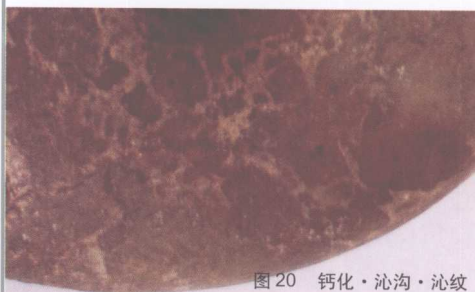


图20 钙化·沁沟·沁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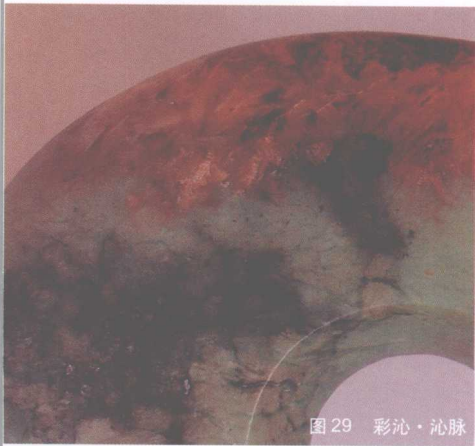


图29 彩沁·沁脉